

# 京津冀都市圈人口流动与跨区域统筹城乡发展<sup>\*</sup>

叶裕民 李彦军 倪 稷

**【摘 要】** 文章通过对京津冀都市圈人口流动特征的分析,认为长期以来京津作为京津冀地区的中心城市,充分享受了对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吸纳的聚集效应,但是由于行政分割,生产要素的扩散作用却被弱化,没有起到中心城市的作用。文章认为,构建京津冀城市圈区域与城乡协调的发展格局,核心任务就是要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建立跨区域城乡统筹发展长效机制,并提出“四步走战略”:推进新型工业化提升京津冀城市群非农产业就业机会;构建以人为本的人口流动管理机制;以“三个集中”谋求聚集经济效应;为广大乡村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关键词】** 京津冀 都市圈 人口流动 城乡统筹

**【作 者】** 叶裕民 中国人民大学城市规划与管理系主任、教授;李彦军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倪 稷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 一、研究背景

发展经济学的经典模型与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通过大力发展城市的现代工业部门、吸纳越来越多的农业剩余人口,使农业人口逐渐减少;同时通过改进农业生产经营技术和推进农业组织制度创新,提高农业的生产经营效率,最后使农业摆脱弱势地位,使农业劳动力也变为稀缺要素的过程。直到二元经济特征逐步消亡、人口也完成相应的二元转变,从而实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目标。按照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M. P. Todaro, 1985)的城乡人口流动理论,发展中国家应控制城乡收入差异,如果听任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不仅会引起城市的很多社会经济问题,而且最终会造成农村劳动力短缺的局面。因此必须鼓励与支持农村的发展,制定出一体化的农村发展规划。在促进非农产业发展和人口乡城迁移的同时,注重采取合适的措施,促进农民农业和非农业收入的增加,扩大农村的就业吸纳能力,同时改善农村医疗、教育服务水平和发展农村的基础设施。这正是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发展战略的深刻背景。

关于如何统筹城乡发展,国内学者做了很多的研究(王锡桐, 2004; 吴永生, 2006; 党国英, 2007; 汪洋, 2007)。这些研究,为中国统筹城乡发展,消除城乡差距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但所有这些研究,都将城乡统筹核定于一定的行政区域之内,研究很少涉及跨行政区域的城乡

<sup>\*</sup> 本文是教育部 2004 年“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项目(NCET)《中国城市化高速成长过程中的统筹城乡发展研究》的中期研究成果。

统筹,这与中国目前的行政体制有关。我们认为,从区域经济角度看,城乡统筹仅仅依靠行政区域内进行还不够,而应该在城市群内进行,这是因为人口及其他生产要素向中心城市的聚集是跨行政区域的,是在整个都市圈内进行的。因此,作为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城镇空间组织形式,都市圈的发展应该既包括城市之间的一体化,也包括城乡之间的一体化,而城乡之间的一体化是基础。这就要求在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中,在都市圈内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

京津冀都市圈是中国的首都地区,也是中国 21 世纪的第三增长极。长期以来该区域是吸纳流动人口的主要区域。但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导致人口流动不平衡;区内人口流动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了区域不平衡。在当前形势下,分析京津冀地区人口流动的主要指向及特征,规划未来的人口流动格局,研究促进跨区域城乡统筹、城乡良性互动的途径,对京津冀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对统筹全国区域发展和推动中国社会经济整体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二、京津冀都市圈人口流动的特征

京津冀都市圈以北京、天津为核心,包括河北省的石家庄、廊坊、保定、沧州、承德、张家口、唐山、秦皇岛、邢台、衡水、邯郸共 13 个城市,陆地面积 21.67 万平方公里,人口 9 432 万人(2005 年底)。从人口流动来看,京津冀都市圈人口流动规模庞大,区内表现出明显的不平衡。

### (一) 京津冀都市圈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高度集中于京津

在京津冀都市圈内,京津是吸纳流动人口的主体。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2000 年京津冀地区外来人口为 413 万,其中北京占 59.7%,天津占 17.8%。石家庄、邯郸、邢台、保定、唐山、秦皇岛和张家口等城市市区虽然也聚集着不少的流动人口,但与京津相比,流动人口分布密度显著下降。2005 年京津冀都市圈外来人口增加到 589.9 万,其中北京为 357 万,天津 104 万,京津两市外来人口规模占到了整个都市圈的将近 80%(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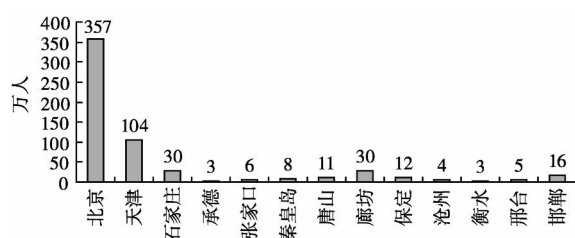


图 1 2005 年京津冀各城市外来人口规模

注:根据《北京统计年鉴(2006)》、《天津统计年鉴(2006)》、《河北省外来人口统计资料》(河北省统计局提供)整理绘制。

### (二) 河北是京津流动人口的重要来源地

在京津冀都市圈流动人口中,河北是京津两市流动人口的重要来源地。2000 年河北省流入北京 55.5 万人,占北京流动人口的 21.3%;流入天津 20.2 万人,占天津流动人口的 27.6%。

表 1 显示出 1987~2005 年主要年份京、津、冀 3 省市迁入的前 3 个主要来源地和迁出的前 3 个目的地的变化。由表 1 可以看出,京津冀都市圈内部相互之间人口流动的特点是:

(1) 河北是北京、天津长期以来流动人口的第一来源地,在京津流动人口中的比重绝大部分时间都在 1/5 以上。(2) 北京和天津也长期成为河北省流动人口的第一和第二目的地,河北省流入北京市的人口占河北省跨省流出人口的 40%左右,流入天津市的人口比例变化较大,占河北省跨省流出人口的 10%~20%。(3) 河北省长期是北京、天津市人口流动的第一目的地,但流出总规模较小。2000 年北京市流入河北省 2.89 万人,占北京市人口流出总量的 14.9%;天津市流入河北省人口 3.25 万人,占天津市流出人口的 22.8%。

表 1 京津冀省际人口迁入和迁出前 3 个主要来源地和目的地的比重 %

地区	第一来源地		第二来源地		第三来源地		合计	第一目的地		第二目的地		第三目的地		合计
	地区	比重	地区	比重	地区	比重		地区	比重	地区	比重	地区	比重	
北京 <sup>a</sup>	河 北	29.0	四 川	5.9	山 东	5.7	40.6	河北	20.9	江 苏	8.8	湖 南	7.4	37.1
北京 <sup>b</sup>	河 北	14.3	山 西	7.7	辽 宁	7.3	29.3	河北	13.9	广 东	8.1	山 东	7.8	29.8
北京 <sup>c</sup>	河 北	27.4	河 南	13.7	安 徽	7.9	49.0	河北	34.9	安 徽	21.3	广 东	8.7	64.9
北京 <sup>d</sup>	河 北	20.1	河 南	12.5	安 徽	8.1	40.7	河北	14.9	江 苏	10.1	广 东	7.8	32.8
北京 <sup>e</sup>	河 北	19.5	河 南	16.0	安 徽	7.9	43.4							
天津 <sup>a</sup>	河 北	35.4	甘 肃	9.4	宁 夏	7.8	52.6	河北	37.6	北 京	27.5	江 苏	10.1	75.2
天津 <sup>b</sup>	河 北	25.8	北 京	9.3	山 西	9.2	44.2	河北	28.1	北 京	22.5	山 东	7.2	57.8
天津 <sup>c</sup>	河 北	38.4	山 东	15.0	河 南	7.2	60.6	河北	30.0	北 京	27.7	江 西	7.2	64.8
天津 <sup>d</sup>	河 北	22.2	山 东	15.3	河 南	7.9	45.4	河北	22.8	北 京	20.0	山 东	6.0	50.3
天津 <sup>f</sup>	河 北	22.9	山 东	19.8	黑 龙 江	11.6	54.3							
河北 <sup>a</sup>	湖 南	31.1	山 西	9.9	内 蒙 古	6.4	47.5	北京	12.2	天 津	16.8	山 西	12.2	62.7
河北 <sup>b</sup>	山 西	13.5	黑 龙 江	12.9	北 京	12.5	38.9	北京	19.6	天 津	14.1	河 南	11.8	45.4
河北 <sup>c</sup>	黑 龙 江	16.1	浙 江	10.3	四 川	9.4	35.7	北京	41.2	内 蒙 古	18.5	山 西	7.2	66.9
河北 <sup>d</sup>	黑 龙 江	13.4	河 南	10.0	内 蒙 古	8.0	31.4	北京	41.6	天 津	12.5	内 蒙 古	5.6	59.7

注：(1)a、b、c、d 分别表示 1987 年中国 1 %人口抽样调查、1990 年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1995 年中国 1 %人口抽样调查和 2000 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2)e、f 分别表示 2003 年北京市外来人口动态监测调查资料 and 天津市 200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三) 京津冀都市圈城市规模体系不均衡性明显

京津冀地区除了北京、天津两个巨型城市,还有两个特大城市(市区人口 200 万~500 万人),但 10 万~200 万人的城市比重占 60 %,明显不足于 84 %的全国平均水平,10 万以下的小城镇又远远比全国平均水平高,表现出明显的两头大、中间小特征。河北人口向京津大量流动,使得京津冀都市圈城市规模体系的不均衡性更加突出。

根据城市位序——规模分布函数(2004 年京津冀地区为  $y = 1930.5x^{-1.64}$ ,方程  $R^2$  为 0.98;全国为  $y = 4553.2x^{0.85}$ ,方程  $R^2$  为 0.89),京津冀地区城市位序——规模函数密指数不但高于 1,而且是全国的 1.92 倍,表明京津冀地区城市人口分布的不均衡性明显。

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相比,京津冀城市体系中超大城市地位突出但大中城市缺位(见表 2)。由于 20 万人~100 万人的大中城市的缺乏,中等城市特有的联结小城市和大城市的纽带作用就难以发挥,从而妨碍生产要素从中心城市向周边地区的扩散。

(四) 流动人口的进入缓解了京津人口老龄化问题

京津冀都市圈在 20 世纪末期就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2004 年,京津冀都市圈 65 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8.79 %,高于 8.56 %的全国平均水平,也高于该地区 1990 年时的 8.56 %。其中北京、天津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 11.12 %和 10.79 %。未来几十年将是人口老龄化过程急剧加速、后

表 2 三大城镇群规模结构对比 %

人口规模(万人)	类 型	京津冀	珠三角	长三角
800 万人以上	超级城市	27.6	23.5	27.8
400~800	巨型城市	13.8	17.6	9.0
200~400	超大城市	4.6	0.0	16.2
100~200	特大城市	9.2	15.5	8.3
50~100	大城市	4.8	4.5	3.7
20~50	中等城市	5.1	9.4	11.6
10~20	小城市	3.5	8.3	9.6
10 万人以下	小城镇	31.4	21.2	13.8

注: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6)》整理得出。

果逐渐显现的时期。预计 2015 年前后,京津冀都市圈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 10%,到 2050 年前后,将达到 23%左右(叶裕民,2007)。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后,抚养比提高,社会负担加重。但是,京津冀都市圈的总抚养比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京津两

市的总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原因在于流动人口对京津冀都市圈的人口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京津外来人口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年轻化(见图 2、图 3)。年轻外来人口的进入,大大缓解了北京、天津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口抚养比上升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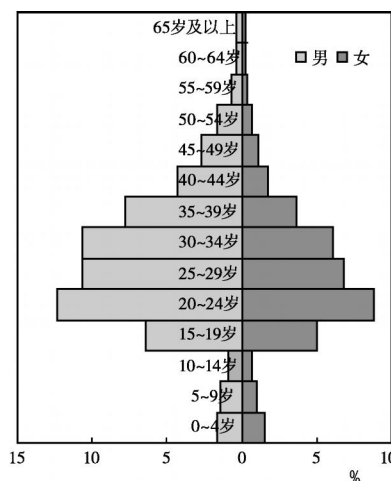


图 2 北京市外来人口年龄结构

注:根据《北京统计年鉴(2006)》整理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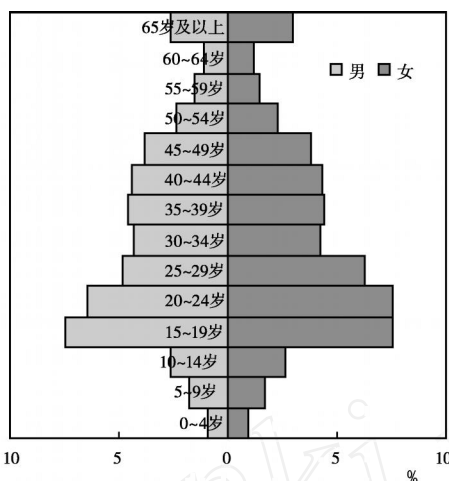


图 3 天津市外来人口年龄结构

注:根据《天津统计年鉴(2006)》整理绘制。

### 三、京津冀都市圈流动人口聚集与都市圈城乡差距

为更清楚地说明京津冀都市圈流动人口的聚集趋势,我们以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选用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区县内迁移占总迁移人口的比与外省迁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 3 个指标对京津冀都市圈流动人口进行聚类。聚类结果显示,第一类地区迁入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 30%以上,迁移距离以远程迁移为主,外省迁移人口占总迁移人口的 50%以上;第二类地区迁入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 20%以上,人口流动以近距离流动为主,外省迁移人口占总迁移人口的 30%;第三类地区流动人口占人口的比重小于 20%,省外流动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 30%以下;第四类地区迁入与迁出基本持平,人口净迁入小;第五类地区为人口净流出区(见表 3)。

聚类结果进一步表明京津冀都市圈人口大量向京津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而这种集中是城市聚集效应的必然结果。缪尔达尔(Myrdal G., 1957)的“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指出,在区域经济成长初期,因为生产要素首先集中在少数点或地区上可以获得较好的效益和发展,所以在要素收益差异的引导下,劳动力、资金等因素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这一现象被缪尔达尔定义为“回波效应”。回波效应使得发达地区愈加发达,落后地区愈为落后,从而导致了区际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不良后果。当发达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生产成本显著上升,外部经济效益逐渐变小,经济发展势头会减弱,这时“扩散效应”的作用强化,落后地区将得到较快发展。然而,从总体上看,由于回波效应占据主导地位,而扩散效应相对不足,市场力量的作用是倾向于扩大而不是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

缪尔达尔认为,这种差距会产生“累积性因果循环”,条件好而且发展快的地区会在发展中

根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5)》公布的数据,2004 年北京市总抚养比为 26.71%,少儿抚养比为 12.62%;天津市的总抚养比为 31.4%,少儿抚养比为 17.23%,都远远低于全国总抚养比(38.36%)和少儿抚养比(26.76%)。

表 3 京津冀地区人口聚类结果

类 型	地 区
第一类	北京市主城区(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宣武区、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海淀区);门头沟区
第二类	天津市市区、塘沽区、大港区、汉沽区
第三类	北京市郊区县(房山区、通州区、顺义区、昌平区、大兴县、怀柔县、延庆县);天津市静海区;石家庄市市区;秦皇岛市区;廊坊市市区、永清县、文安县、大厂回族自治县、霸州市、三河市;保定市高阳县、容城县、安新县、蠡县、高碑店市;沧州市任丘市
第四类	北京市平谷县、密云县;天津市宁河县、宝坻县、蓟县;石家庄市井陉矿区、井陉县、正定县、栾城县、灵寿县、高邑县、无极县、元氏县、赵县、辛集市、藁城市、晋州市;唐山市市区、丰润县、滦县、滦南县、迁西县、玉田县、唐海县、丰南市;秦皇岛市昌黎县;邯郸市市区、峰峰矿区、临漳县、涉县、磁县、永年县、邱县、鸡泽县、馆陶县;邢台市市区县(除隆尧县、任县、新河县、广宗县、威县、沙河市);保定市市区、清苑县、曲阳县;张家口市市区;沧州市市区、青县、东光县、盐山县、吴桥县、献县、泊头市、黄骅市;廊坊市固安县、香河县、大城县;衡水市市区、饶阳县、安平县
第五类	一、二、三、四类之外的其他区县

不断积累有利因素,从而发展得更快,结果会进一步遏制困难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困难地区不利于发展的因素越积累越多,从而发展更慢。在市场经济制度下,一些地区的繁荣常常是以另一些地区的贫困为代价的。这种“累积性因果循环”在京津冀都市圈内部依然存在。按照行政区划考察城乡差距,两市一省内部的城乡差距都小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这种考查割裂了京津冀都市圈整体间的相互联系,也把京津冀都市圈最发达的城市和最落后的农村隔离开来,人为地低估了这里的差距水平。在市场选择领域,京津是京津冀的劳动力就业和民间资本选择的主要空间;然而由于行政分割,京津向河北省的扩散又显不足。其结果必然是加剧京津冀都市圈内京津两个现代化的国际性大都市与贫困落后的河北农村之间的差异。

2005 年京津冀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县达 57 个,全部分布在河北省,占河北县(市)总数的 42%,行政区划面积 11.24 万平方公里,人口 1986.2 万,分别占京津冀地区总面积和总人口的 52% 和 21.1%。

从京津冀都市圈内部来看,2005 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7 653 元,是河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5.1 倍。其中 57 个县农民人均纯收入没有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只有 2 507 元,不足北京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 15%,不足天津市的 20%。若以北京市 2005 年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每月 300 元,每年 3 600 元作为衡量的尺度,则河北省农民年均收入低于这个保障标准的县达 68 个,行政区划总面积 12.1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 2 424 万,分别占京津冀地区总面积和总人口的 56% 和 25.7%,并且其中的赤诚、丰宁、滦平、承德、兴隆、涿鹿和涑水七县竟直接与北京市接壤(见图 4)。

#### 四、推进跨区域统筹城乡发展是提升京津冀都市圈整体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河北大量人口向京津的流动,不仅加剧了河北的城乡失调,也给京津自身的发展造成严重影响:(1)区域中心城市与乡村发展不协调;中心城市国际化、现代化与区域内大量乡村贫困并存;中心城市高等教育人才相对充裕的供给与乡村地区基础教育供不应求并存。(2)京津发展的社会成本不断增加如人口管理成本、无序建设的成本、警察成本增加,犯罪率增长等。2004 ~

我们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来考查城乡差距。2005 年,北京城乡居民收入比为 2.53,天津为 2.28,河北为 2.51,均低于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比 3.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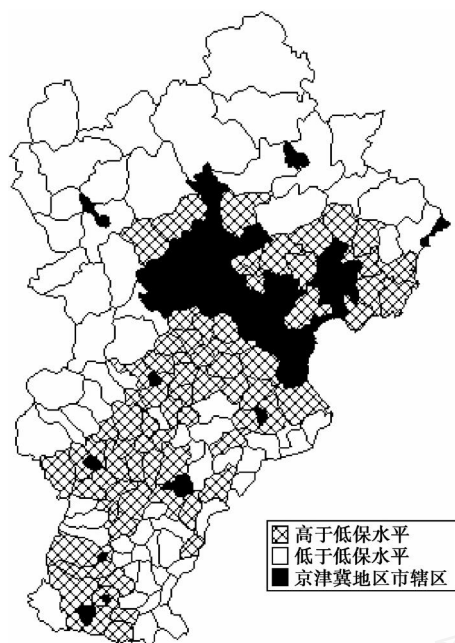


图4 2005年河北省各县(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北京市低保标准对比

2005年北京市GDP增长为11.8%,刑事立案案件增长15%,北京刑事立案案件的增长远远快于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的一部分被社会管理成本的增加而抵消。因此,京津冀地区巨大的城乡差距及这种差距的空间特性,已经成为都市圈乃至整个区域竞争力提升的重大障碍。

### (一) 亟待构建京津冀跨区域统筹城乡发展长效机制

缪尔达尔认为,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使各地区经济最终得到均衡发展的观点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如果仅仅依靠市场力量运作,现存的差别和不均衡现象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加剧。缪尔达尔指出,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不宜过大,当发达地区发展起来后,为了防止积累性因果循环造成的贫富差距无限扩大,不应消极地等待扩散效应来消除这种差距,政府应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刺激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帮助不发达地区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以缩小这种差距,统筹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协调发展。

就京津冀都市圈而言,由于行政分割,旧有的机制和框架下难以解决京津冀区域性矛盾和区域性的城乡失调问题,必须建立跨区域城乡统筹发展长效机制。

### (二) 京津冀都市圈跨区域统筹城乡发展四步走战略

京津冀地区统筹城乡发展核心的任务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改变传统体制下各自为政的管理制度,将农村特别是河北省农村发展纳入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的框架之中。以建立京津冀跨省市的互动协商机制为前提,京津冀跨区域统筹城乡发展应该实施四步走战略。

#### 1. 推进新型工业化提升京津冀都市圈非农产业就业机会

构建京津冀合理的城市体系框架,努力推进京津冀新型工业化进程,尽可能地通过技术进步、延长产业链、发展现代服务业体系来扩大就业。

京津中心城区适合发展高端服务业,并通过提高服务业技术装备提升高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减少服务人员数量,同时运用规划的手段及市场的力量引导包括教育、卫生、体育、商贸等一般性专业化发展的服务业向郊区及河北省转移;天津滨海新区要以现代制造业为主体形成新一轮产业链的聚集,并通过产业链的扩散给周边地区发展的市场机会;京津郊区应在承接京津中心城区产业转移的同时,促进一批不同类型产业集群的城市产生,其中包括各类制造业产业集群和服务业产业集群,如大学城、体育城、家具城、医疗与休闲疗养城市等;石家庄、衡水、邯郸、邢台等城市要重视县域经济发展,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尽可能与京津建立产业关联,参与京津冀新时期的分工与合作,跟着产业链同步走向市场;张家口和承德作为京津都市区的水源和风沙源,自然环境承载力较弱,需要适度限制污染型产业的发展。但是,中心城市、县城和重点镇仍然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发展相应的产业,特别是针对京津大市场,发展绿色

根据《北京统计年鉴(2006)》计算得出。

农业和绿色食品加工工业,建立京津绿色环保产业基地,尽可能多地吸纳地方劳动力。

由于京津冀产业格局所决定,未来时期京津冀仍然主要呈现出向心型人口流动,只是核心在不断扩大,由原来以北京市为主,逐步转变为以沿海高速增长区域和次高速增长区为主,其他各中心城市、县城和中心镇为辅的增长格局。如果京津冀产业发展规划落实程度高,则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各级各类城市转移就具备了基本的市场基础。

## 2. 构建以人为本的人口流动管理机制

城市化是“化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以人为本,则应该首先以“被化的乡村人口”为本,以满足他们基本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为本。建立开放的户籍管理制度时要从人口流动管理和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视角看,要将城市化进程驶入健康发展的轨道,要求中心城市担负起完全接纳流动人口的历史性责任,构建“就业+社会保障+合法住宅=城市户口”的户籍管理制度。随着产业的发展,以就业引导人口流动,以制度稳定流动人口,构建和谐的发展秩序,这是推动城市化健康发展的核心与关键。

## 3. 以“三个集中”谋求聚集经济效益

构建了人口有序流动的平台以后,需要解决人口往哪里流的问题。“三个集中”是指产业向产业发展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推进“三个集中”是谋求新型工业化时期城市化的聚集经济效益,构建多层次城乡互动、共同发展的重要路径,是城市吸纳富余劳动力、乡村减少人口压力、推动现代农业发展3个过程在空间上的统一。

## 4. 为广大乡村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为广大农村地区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保障,这既是提高乡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必要手段,也是提高乡村居民基本素质,保障他们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以后能够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基本手段,是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必要举措(叶裕民、李彦军,2007)。

京津冀地区为乡村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的难点在于:需要构建跨区域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京津应真正发挥中心城市职能,在援助河北欠发达地区发展的过程中承担起相应的职责。

## (三) 建立京津冀都市圈欠发达区域援助基金

建立跨区域的城乡统筹机制,发挥京津在河北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积极作用,其本质就是要建立起京津对河北省欠发达地区资金扶持的长效机制。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扶持落后地区的时候,往往是通过成立一些目标明确的基金,为欠发达地区的各个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提供规范的资金支持。借鉴他们的经验,我们建议成立京津冀欠发达区域援助基金来统一管理援助河北欠发达地区的资金。该基金除了促进河北省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还应以促进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为其目标。在初始阶段,基金以向河北贫困的农村地区提供全面的公共服务,促进城乡居民在发展机会和能力上的平等为首要目标。基金的最高决策机构是市长联席会议,由京津冀地区2个直辖市和河北省的11个地级市的市长组成,以投票的方式做出基金的最终决策。市长联席会议成员在表决时拥有不同的票权,它与各市的经济政治地位和基金中的投入份额相关,但河北省各市与京津也要形成相互制约的格局。基金的来源为京津两市对河北省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河北省级财政中对该地区的转移支付、由两市一省政府争取到的中央对该地区的扶持资金、向国际组织和民间人士募集的捐赠,以及以基金为资本

欧盟的结构基金与团结基金,对落后地区和欧盟中的贫穷国家给予扶持;意大利的南部开发基金、西班牙的地区补偿基金与巴西的社会一体化基金都是以缩小地区差距为目的。

金吸引的银行贷款。

我们以人均 GDP 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 60 %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 80 %这两个指标来划定受援地区。同时满足两个指标的,为第一类受援区域,只满足其中之一的,为第二类受援区域。以 2005 年的数据计算,第一类受援区域面积为京津冀地区的 35.35 %,人口为 10.7 %,而 GDP 仅为 2.8 %,是基金援助的重点区域(见表 4),每年援助资金总额的 70 %使用在第一类受援区域。

表 4 京津冀欠发达地区援助基金的援助区域

第一类受援区域	承德县、平泉县、隆化县、丰宁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自治县、张北县、康保县、沽源县、尚义县、蔚县、阳原县、怀安县、 <u>万全县</u> 、赤城县、崇礼县、青龙满族自治县、 <u>阜平县</u> 、唐县、涞源县、曲阳县、顺平县、 <u>海兴县</u> 、新河县、广宗县、威县、大名县、魏县、 <u>赞皇县</u> 、 <u>平山县</u> 、 <u>滦平县</u> 、 <u>宣化县</u> 、 <u>涿鹿县</u> 、固安县、永清县、清苑县、涿水县、定兴县、望都县、安新县、易县、博野县、盐山县、南皮县、任县、南和县、巨鹿县、平乡县、临西县、南宫市、临漳县、曲周县
第二类受援区域	

注:加黑的是国定贫困县,加下划线的是位于京津冀都市圈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和重要水源涵养区的县。

建立跨区域的统筹城乡发展的协调机制,不仅可以帮助河北实现经济起飞与发展,也有利于京津发展环境的改善与都市圈整体竞争力的提升。由于行政上分省(直辖市)而治,跨区统筹较区域内城乡统筹面临更多的困难与制度障碍,但只要三地政府积极实施制度创新,主动担负起相应的职责,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扶持力度,京津冀都市圈城乡一体,各城市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就会形成。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1988):《中国 1987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
2.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1993):《中国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
3.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司(2002):《中国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
4. 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办公室(1997):《199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
5. 国家统计局(2007):《2005 年天津市 1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
6. 北京市统计局(2006):《北京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
7. 天津市统计局(2006):《天津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
8. 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2006):《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
9.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05):《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5)》,中国统计出版社。
10.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2006):《河北经济年鉴(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
11. 国家统计局(2005):《中国统计年鉴(2005)》,中国统计出版社。
12. 国家统计局(2006):《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
13. 叶裕民(2007):《中国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科学出版社。
14. 叶裕民、李彦军(2007):《成都城乡一体化的政策支持:公共服务系统推进》,《成都商报》。
15. 王锡桐(2004):《城乡统筹与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第 10 期。
16. 吴永生(2006):《区域性城乡统筹的空间特征及其形成机制——以江苏省市域城乡为例》,《经济地理》,第 5 期。
17. 党国英(2007):《统筹城乡发展要有更积极的城市化政策》,《中国城市经济》,第 12 期。
18. 汪洋(2007):《以城乡统筹发展为主线促进重庆更好更快发展》,《求是》,第 13 期。
19. Myrdal G. (1957), *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 London: Methuen & Co Ltd.
20. Michael P. Todaro(1985),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 Longman Inc. New York & London.

(责任编辑:朱 萍)





based on previous researches, which measures population quantity, population quality,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population momentum. Next, projection pursuit classification model is applied to analyze the population competitiveness of 31 provinces across China. It is found that projection pursuit classification model has a very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differentiating provinces. The 31 provinces of China can be classified into seven categories according to the projection pursuit classification scores.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population competitiveness based on different region schemes is also revealed.

#### **The Migration within Beijing-Tianjin-Hebei Metropolitan Area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Ye Yumin Li Yanjun Ni Ke ·57 ·

By analyzing migration characteristic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Metropolitan Area, this paper argues that despite Beijing and Tianjin as the central cities of the area have for a long time benefited from the conglomeration effects of labor and other production factors, the diffusing effects from them to the surrounding have been obstructed by administrative segmentation. The primary task for a harmonious prospect of rural-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within BTH metropolitan area is to break the existing administrative delimitation, in order to include the rural Hebei into the framework of promoting the competitiveness in the metropolitan area. This paper also suggests a strategy to facilitate the process.

#### **The Impact of Time Varying Properties on Migration Selectivity: A Perspective from Data Management**

Tang Jialong ·65 ·

Time-varying factors have been attached highly importance in the methodology of migration research. Using the 2000 Chinese population census micro data, this paper presents three methods (survey time method, partial retroversion method and holistic retroversion),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implication but closely related in the way of data structure. The variable choice in methods demonstrates a sharp contrast effect in data structure in the means and variance of the variables. Besides, it also alters the strength and significance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on the dependent variable. The holistic retroversion benefits the research in finding a diverse pattern of educational selectivity for migration other than a uniform one of positive selection,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empirical observation.

#### **The Transfer of Land Security Rights, Labor Migration and Efficient Use of Rural Land**

Zhang Liangyue Liu dong ·72 ·

Though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had resolved rural poverty successfully in China, it hindered the labor migration to urban areas for not providing rural land transfer rules.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labor migration are not only due to the obstacles of the urban hukou system, but also because of the rules of the rural land use. We therefore argue that the government must carry out the transfer of land security right while reforming the hukou system, and then the rural labor can migrate permanently, and the agricultural land can be used more effectively.

####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s: Survey and Analysis on 10 Villages in Gansu Province**

Zhang Yongli Huang Zuhui ·80 ·

The paper uses the data obtained from 10 villages in Gansu province to compar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tendency between two generations of migrant laborers.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mobility of rural labor in China has entered into a new stage, and the second generation who are born in the reform and opening time is becoming the major component. Their opinions, reasons, behavior for migration, and expectation for life have changed greatly. These changes will have profound influences on China's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 **An Analysis on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f Rural Married Female Labor in Jiangsu**

Liu Yan Tuo Jiqiang ·88 ·

This paper is to build a probit model to analyze the factors which affect the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f rural married female labor based on the survey in Jiangsu province.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ssibility of women's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is decreasing with age increase; well educated women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non-agricultural jobs and to enter local enterprises; skilled women prefer working in urban areas to rural areas; those whose husbands are engaged in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have more opportunities to attend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Moreover, the ability of absorbing non-agricultural labor from the rural areas in Central and Northern Jiangsu is weaker than that of Southern Jiangsu, so the main approach to non-agricultural jobs for women in these areas is to migrate out.